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6 年 7 月 1-3 日)

1、美国西点军校现代战争研究所：自主战场机器先行亟需补齐指挥权责空白

6 月 26 日，美国西点军校现代战争研究所发表学者布拉克·奥克滕利（Burak Oktenli）的文章《机器先行：弥合自主战场的权责鸿沟》。文章结合 2025 年人工智能主导的大规模网络攻击案例表示，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可自主完成网络入侵全流程作业，机器推理与实战行动的间隔大幅压缩。同时，无人作战系统加速作战节奏，造成人类指挥授权与机器自主行动的权责缺口。美方虽已在现有国防政策中明确自主武器必须保留人类做出最终决策的权力，但仍缺乏切实的落地执行机制。文章认为，审核滞后、零散行为累积成致命危害、人工智能防护可被对手诱导突破，是权责缺口的三大成因。基于限制人工智能运行速度会丧失战场优势的基本判断，美军应重构底层管控机制，通过外置独立权限校验、高风险行动无授权即终止、按目标风险分级划定自主权限的方式，平衡人工智能作战效能与人类管控权。

<https://mwi.westpoint.edu/when-the-machine-acts-first-closing-the-authority-gap-on-the-autonomous-battlefield/>

编译：钟珺雯

2、美国兰德公司：人工智能智能体使非专业用户具备进行网络攻击的能力

6月25日，美国兰德公司发表本杰明·斯佩里森（Benjamin Sperisen）等人撰写的报告《人工智能智能体将进攻性网络能力置于非专业用户可及范围之内》。文章比较了2025年与2026年人工智能在进攻性网络任务中的表现，表明网络攻击技术门槛已大幅降低。2025年8月，尽管尖端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已能辅助参与者应对夺旗赛（CTF）挑战，但面对难度较高的题目时，参与者普遍感到力不从心，而在更具挑战性的比赛中，用户几乎从未成功完成任务。然而，研究团队使用搭载 Sonnet 和 Opus 4.6 的 Claude Code 对相同挑战重新测试后发现，这些模型在不到一小时内、仅需极少指导的条件下即可完成所有挑战，且总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调用费用低于 20 美元。这意味着，2025 年非专业用户无法掌握的进攻性网络能力，如今已向任何能够安装 Claude Code 的用户敞开。攻击者无需依赖他人编写的恶意代码，人工智能可按需生成并运行漏洞利用脚本。此外，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能够利用之前不同模型已取得的进展推进攻击。这种“搭便车”式攻击可在系统漏洞仅被部分修复或网络攻击事件未完全解决时发挥作用。其利用系统的速度比基准测试更快、成本更低，并会进一步混淆归因。在人工智能

能力快速跃升的现实背景下，被动存在漏洞的系统所构成的夺旗赛环境正趋于饱和，未来的安全评估很可能需要纳入具备侦测与反击能力的主动防御者，才能应对现实变化。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3892-2.html

编译：张佳延

3、美国技术政策研究所：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应转向制度建设

6月29日，美国技术政策研究所发表亚洲人工智能安全组织政策负责人迈克尔·L.巴克（Michael L. Bak）、创始人苏佩克蒙科尔·萨林（Supheakmungkol Sarin）及全球事务幕僚阿德里安·马克（Adrian Mak）撰写的文章《世界不需要另一份联合国人工智能宣言，它需要的是架构》。文章认为，联合国即将举行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应超越原则性宣言，进一步构建能将价值共识转化为治理行动的制度架构。现有治理权力主要集中于少数发达经济体及其科技机构，而亚洲和全球南方国家往往在本土治理能力尚未成熟时就被动接受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国作为唯一允许各国平等参与的多边平台，应让全球多数国家真正参与规则制定与执行。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对话应以落实成效而非参与度为标准，建立明确的后续机制。第二，能力建设应成为治理基础而非附属议题，需培养监管人才并建设配套设施。第三，应承认全球多数国家的专业知识与生活经验也

是治理知识，因为当前人工智能辩论过度受商业利益与国家安全叙事主导，忽视制度侵蚀与文化排斥等伤害。第四，应为灾难性与生存性风险提供正式讨论空间，使全球多数国家参与风险框架塑造。文章最后强调，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对话的成败不在于宣言本身，而在于会后建立了什么机制、由谁主导以及服务于谁。

<https://www.techpolicy.press/the-world-doesnt-need-another-un-ai-declaration-it-needs-architecture/>

编译：杜宛鸿

4、美国《科技政策报》：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应当抵制三项诱惑

6月30日，美国《科技政策报》官网发表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康斯坦丁诺斯·科迈蒂斯（Konstantinos Komaitis）的文章《联合国首次全球人工智能对话：日内瓦会议面临的三重诱惑》。文章认为，国家间人工智能合作的重要性不断增强，而合作的动力却在持续减弱，若需要开展有意义的国际合作，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对话应当抵制三项诱惑。第一项诱惑是回避安全议题。安全问题是当前各国政府理解人工智能的核心议题，不应排斥军事应用、网络韧性、供应链安全等具有现实意义的安全问题的讨论。第二项诱惑是让安全议题主导全部讨论。此次对话的目的是保证不同治理模式在存在差异的同时仍具有可互操作性。治理问题的安

全化将会压缩国际合作空间、降低透明度、限制技术合作并将全球治理转变为政治谈判。第三项诱惑是将全球南方国家视为地缘政治竞争的主要对象。应当重视发展中国家在算力基础设施、能力建设与本地语言模型等方面的现实需求，使其以平等参与者身份共同塑造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议程。文章认为，衡量此次对话成功与否的标准，并非各国是否在人工智能治理层面形成全面共识，而是在人工智能越来越被视为战略竞争对象的背景下，各国政府是否仍然愿意彼此保持对话。

<https://www.techpolicy.press/the-three-temptations-facing-the-uns-first-global-ai-dialogue-in-geneva/>

编译：程果

5、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轨道数据中心的现实鸿沟凸显太空治理风险

6月25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发表研究员劳伦·托科斯（Lauren Tokos）的文章《轨道数据中心的现实鸿沟构成治理风险》。文章认为，为突破人工智能扩张面临的陆地电网瓶颈与选址阻力，科技巨头正大力推销轨道数据中心概念。然而，该设想目前仍存在巨大的可行性鸿沟。太空真空环境缺乏吸收热量的大气，仅依赖热辐射散热则需建设数百万平方英尺的散热设备；此外，高强度紫外线辐射、高昂维护成本及太空垃圾等物理与工程挑战也极大限制其实际部署。文

章认为，当前美国太空监管体系松散，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及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大多各自为政，缺乏协调机制。SpaceX 等企业利用监管空白兜售难以实现的解决方案，不仅迫使竞争对手产生技术依赖，加剧太空通信市场的垄断趋势，还可能引发漂绿骗局及太空环境恶化等严重后果。文章强调，市场资本不应成为技术进步的唯一驱动力。美国需与全球伙伴合作完善太空治理体系，建立跨部门工作组以审查新兴技术在应用过程中的科学可行性与环境影响，遏制市场巨头的反竞争行为，确保太空创新真正服务于公众利益。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orbital-data-centers-feasibility-gap-is-a-governance-risk/>

编译：孙韵雯

6、美国 CFR：美国以出口管制为由封禁前沿人工智能模型暴露监管真空

6月26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网站发表其主席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Froman）的文章《人工智能治理的迷思、寓言与真相》。文章认为，美国通过实施出口管制，禁止任何外国公民使用 Anthropic 公司的最高级别模型，实际上对模型构成了全面封禁，暴露了美国的人工智能监管真空与全球信任危机。关于封禁被触发的原因众说纷纭，一说因 Anthropic 未经许可向韩国电信公司共享模型；一说源于

该公司此前限制五角大楼将其产品用于完全自主武器与大规模国内监控；一说因第三方研究者破解模型并用于网络危险用途。弗罗曼认为，第一，无论具体诱因为何，此事标志着人工智能治理迎来了历史转折点。最新模型正被当作潜在国家安全威胁来对待，而监管进程却明显滞后。这种滞后与当前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所倚仗的前提——即技术必须快速普及、广泛采用方能实现回报形成了直接矛盾。此外，美国迄今缺乏综合性联邦人工智能立法，政府只能以出口管制和供应链风险指定等临时法律手段进行监管。第二，禁令还暴露了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的困境。美国展示了随时切断外国获取前沿模型的能力，迫使其他国家在依赖可能随时失效的美国模型与使用中国开源模型之间做出选择。弗罗曼认为，这可能加剧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碎片化，促使各国选择人工智能主权而非依附，进而削弱美国定义全球人工智能架构的目标。

<https://www.cfr.org/articles/myths-fables-and-hard-truths-about-ai-governance>

编译：张方琼宇

7、美国《国家利益》：伊朗协议的战略价值在于聚焦大国竞争

7月1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表新线研究所首席战略官阿齐姆·易卜拉欣（Azeem Ibrahim）的文章《特朗普

伊朗协议中的真正胜利》。文章认为，部分批评者认为协议未能彻底消除伊朗导弹计划、铀浓缩能力和地区代理人网络，但这类观点忽视了更宏大的地缘政治现实。近 20 年来，美国两党已形成共识：中国才是美国首要竞争者，但美国却长期深陷中东事务，每一支部署到波斯湾的航母编队都意味着可用于台海或南海威慑的资产减少。文章认为，美国无法在与伊朗持续对抗的同时有效应对中国挑战，因此与伊朗达成协议本质上是一次刻意的战略再校准，目的是将资源、注意力和政治资本释放出来，聚焦于未来数十年的决定性竞争。特朗普的做法并非源于软弱，此前美国已展示了相当的军事决心，伊朗以明显更脆弱的位置进入谈判。文章将特朗普的果断转向与越战时期的约翰逊、尼克松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时期的奥巴马进行对比，认为这些领导人明知冲突难以为继却因面子、国内政治或盟友压力而拖延，而特朗普则展现了罕见的政治勇气和分析成熟度，以结果而非表象为导向。协议并非完美，伊朗仍是麻烦制造者，但比起追求政权更迭或全面解除武装所引发的更大风险，此举至少为美国聚焦创新、供应链韧性、军事现代化和对华竞争创造了空间。真正的胜利不在于协议本身，而在于战略聚焦的回归。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middle-east-watch/the-real-victory-in-donald-trumps-iran-deal>

编译：白一冰

8、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民权运动的成果正在被逆转

6月29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发表西北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阿尔登·莫里斯（Aldon Morris）的文章《民权运动未竟的事业》。文章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一系列法案瓦解了限制美国黑人权利的吉姆·克劳（Jim Crow）制度。研究美国民权运动的大部分理论默认这些法案的成功是永久的，忽略了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持续存在的能力。平权行动的成果在最高法院的多个判决中受到削弱，美国南方黑人的政治代表性被“杰利蝾螈”现象（Gerrymander）所消解。美国社会学家、民权运动领袖杜波依斯（Du Bois）曾指出，种族主义是通过代际传递而延续的文化心理遗产不会在推动平权的立法后消失，而是会潜入地下，等待政治时机再次浮现。随着极右翼与另类右翼的兴起，原本处于边缘位置的激进白人至上主义者吸纳了具有反建制情绪和同样持有威权主义等观点的群体。如今美国社会中部分群体攻击多元、平等与包容（DEI），将保守派视为“另类右翼”、独立选民为“偏左”、进步派为“激进左翼”。美国传统基金会“2025计划”（Project 2025）是重新将种族支配的结构制度化的行动纲领。“民主2025”（Democracy 2025）的成立是为对抗以此为中心的侵犯自由、民主价值的力量，但其能否在长期斗争中产生影响，仍有待观察。在历史上，当民权运动取得胜利后，往往会出现反对浪潮。因此，结束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只是开始，而非终点。文章提出四项政策建议：其一，恢复并加强

《投票权法》；其二，长期投资黑人社区的公民基础设施，例如维护持续运作、监督和问责民选官员的公民组织；其三，通过教育政策抵制民权运动历史教学中的文化倒退；其四，推动缩小种族经济资源差距的联邦政策，为黑人政治权利的提升提供基础。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he-unfinished-work-of-the-civil-rights-movement/>

编译：高靓瑜

9、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东与北非地区美中趋同大于分歧

7月1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研究员阿米尔·哈姆扎维（Amr Hamzawy）与凯瑟琳·塞尔夫（Kathryn Selfe）的文章《在中东与北非，美国与中国趋同大于分歧》。文章认为，对中东与北非（MENA）地区中等国家而言，美中竞争并非威胁而是机遇。两国在该地区利益高度一致：均致力于保障自由贸易与地区稳定，且利益兼容而非冲突。一是在军事上，美国凭借基地网络、安全协议及占MENA武器进口64.3%的份额保持绝对优势；中国无军事基地，避免正式防务承诺，以反战姿态赢得地区好感。但中国的军事劣势也限制了其危机应对能力，如红海危机期间难以有效介入。二是在经济上，中国主导地区贸易，2024年海湾合作委员会从中国进口达2880亿美元，远超美国的860亿美元；中国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基础设施领域保持领先优势，2024 年对MENA投资达 390 亿美元。美国则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布局，但特朗普政府解散USAID并削减国际援助的行动则削弱了自身经济影响力。三是在外交与软实力方面，中国与MENA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美国则因与伊朗对立、加沙政策及伊朗战争等面临外交限制。2023 年 10 月后阿拉伯公众对美好感骤降，最新调查仅 32.8%的受访者对美国持正面看法，而 64.3%对中国持正面看法。文章认为，地区国家正利用美中竞争在多领域“对冲”：军事上在特定武器采购上转向中国；技术上在AI领域同时与两国合作；经济上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等机制；外交上同时加入美中各自主导的多边组织。因此，中美两国在MENA的趋同点远大于分歧，任何迫使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企图只会适得其反。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6/07/middle-east-north-africa-united-states-china-trade-military-diplomacy>

编译：罗方婕

10、美国PIIE：250 多年来美国一直在为贸易争论

7 月 1 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发表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道格拉斯·A.欧文（Douglas A. Irwin）发表文章《美国对贸易的争论已持续超过 250 年》。文章认为，在美国迎来独立 250 周年之际，关于贸易与关税的公开争论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次白热化。海外贸易自 17 世纪

初起就是北美殖民地赖以生存的基础。1787 年宪法颁布后，贸易占美国GDP的比重曾高达 10%-20%。随后因经济重心向中西部转移以及工业多样化和高关税的推行，该比例稳定在 5%-10%的较低水平。1970 年代起，贸易占比重回 10%以上，而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该比例一直在下降。美国关税率曾于 1828 年达到 60%的峰值并引发政治危机，南北战争后共和党长期通过高关税保护本土工业。二战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使关税持续走低。然而，近年来特朗普政府通过大规模加征关税逆转了这一进程，导致 2025 年关税水平显著跳升，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占GDP比重也随之加速下滑。文章强调，美国当前的关税争论是其 250 年历史传统的延续，而这场全美的贸易辩论注定会持续多年。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s/2026/us-driving-away-international-students-long-term-economic-cost>

编译：陈奕好

11、美国《外交政策》：特朗普并未真正放弃联合国体系

6 月 30 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发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高级研究员苏珊娜·诺塞尔（Suzanne Nossel）的文章《特朗普并未真正放弃联合国体系》。文章认为，尽管特朗普政府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并削减相关资金，但难以抛弃联合国体系，而是在公共卫生、人道援助、技术治理、移民和地区安全等领域继续借助多边机构维护美国利益。这体现

了多边主义的内在价值，也揭示美国“退出政治”的局限。事实证明，特朗普政府的实际政策并非始终与其反多边主义言论一致。在埃博拉疫情等现实压力下，美国重新参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与此同时，其一方面退出多边机制、削减援助，希望联合国“更小、更弱、更顺从”，另一方面又继续支持部分全球卫生合作，利用联合国及其技术机构、国际移民组织和安理会推进公共卫生、技术标准、移民管理和地区安全等事务。可见，宣布退出多边体系远比真正摆脱多边体系容易，美国处理跨国问题仍离不开联合国等全球性平台。但特朗普政府一边继续利用联合国解决具体问题，一边削弱其影响力，可能导致美国制度影响力流失。在美国可能将短期胁迫误认为长期影响力的风险下，联合国正面临逐渐滑向以实用价值换取支持的交易式多边主义的风险。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6/06/30/trump-united-nations-multilateral-system-gavi-humanitarian-funding/>

编译：贺宇希

12、美国《国家利益》：特朗普对华政策重蹈奥巴马覆辙

6月30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表美国企业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达斯廷·沃克（Dustin Walker）的文章《对待中国政策上，特朗普正在重蹈奥巴马覆辙》。文章认为，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对中国态度较第一任期软化，重蹈奥巴马时期为追求合作而搁置竞争的覆辙。文章认为，政策制定者常误以

为唯有中国减少激进竞争，美国才愿意与其合作，由此催生了“中国日程”的顽疾，即为避免触怒中国或破坏既定外交活动，单方面推迟或取消竞争性举措的倾向。此前，奥巴马政府为寻求与中方达成气候协议，暂停新军售长达 4 年；5 月中美元首峰会仅延长了贸易停战协议。文章认为，特朗普绝不能妥协，最重要的是，不应在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留下任何分歧空间。只有当中国认识到美国并非孤军奋战时，特朗普在谈判桌上的地位将更稳固。文章强调，国会也必须履行自身职责、支持美国盟友。与中国关系更加稳定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考验的不是美国的克制能力，而是其决心。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on-china-donald-trump-is-making-barack-obamas-mistake>

编译：李泓静

13、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欧洲需补齐放射性与核威胁探测短板

6 月 25 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欧洲中心高级研究员雅采克·谢维拉(Jacek Siewiera)与北约前核政策主任吉姆·斯托克斯(Jim Stokes)的文章《放射性和核威胁不再是假设情景，欧洲需要作出回应》。文章认为，欧洲近期连续发生放射性事件，暴露其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威胁探测与应对体系存在结构性缺口。波兰梅迪卡边境口岸查获辐射超标纸币，

伦敦肯辛顿花园因亲伊朗组织声称以无人机投放放射性材料而关闭。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显示相关威胁正通过旅客行李、无人机、物流网络和城市交通系统向民用空间渗透。欧洲现有放射性监测体系主要服务于切尔诺贝利事故后大规模大气污染预警，难以应对低阈值、非国家行为体、依托民用基础设施扩散的新型威胁。同时，欧盟外部陆地边境辐射监测设备长期依赖美国能源部资助，美国城市放射性和核探测网络则明显领先欧洲。文章建议，欧盟应利用 2028 年至 2034 年长期预算谈判契机，为欧洲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探测基础设施设立专项资金，将城市物流、公共交通和市政数据纳入分布式早期预警网络，降低对美国基础设施依赖。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dispatches/radiological-and-nuclear-threats-are-no-longer-hypothetical-europe-needs-to-respond>

编译：黄千茹

14、美国《外交事务》：极端天气将颠覆美中竞争格局

6 月 30 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爱丽丝·希尔（Alice Hill）和斯坦福大学的高级科学家朱梦烨（Mengye Zhu）的文章《极端天气将颠覆美中竞争格局》。文章认为，气候适应能力已成为中美竞争中决定未来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关键因素。随着全球变暖，极端天气对中美两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供应链、保险市场和劳动

生产率构成了巨大威胁。中国已将适应气候变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通过投入巨资建设“海绵城市”、升级韧性电网及调水工程，并辅以金融工具和技术手段全面提升抗灾能力，现已建立起自上而下的气候防备体系。相比之下，美国缺乏连贯的国家战略，特朗普政府不仅否定气候风险，还削减了多项联邦层面的气象预警和气候研究项目。虽然部分州和城市在进行局部自救，但远不足以应对跨区域的系统性威胁。在未来的经济较量，尤其是耗电量巨大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竞争中，与气候相关的断电和基建受损将直接削弱国家竞争力。同时，气候适应本身也催生了庞大的新兴技术市场。如果美国继续无视气候风险并停止相关投资，不仅将承受巨额灾害损失，更将丧失未来相关产业的主导权。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extreme-weather-will-upend-us-china-competition>

编译：陆知宜

15、美国 CSIS：人工智能算力扩张引爆“内存荒”

6月25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研究员什鲁蒂·沙尔马（Shruti Sharma）的报告《人工智能出现存储不足问题》。报告认为，随着存储制造商将产能转向人工智能导向产品，全球内存供应正面临需求激增与产能瓶颈的双重挤压。尽管先进逻辑芯片备受关注，但内存可用性可能成为制约人工智能部署与工业竞争力的关键变量。宏观而

言,2024 年全球内存销售额增长近 79%至 1650 亿美元,2025 年预计突破 2230 亿美元,其主要驱动力来自高带宽内存,即一种专为人工智能工作负载设计的高速数据传输芯片。SK 海力士 2026 年高带宽内存产能已全部售罄,不再接受新订单。OpenAI 的“星际之门”项目每月需求高达 90 万片 DRAM 晶圆,约占全球 DRAM 产出 40%。预计到 2026 年,全球约 70% 内存产出将流向数据中心应用。这导致依赖内存技术的汽车、医疗设备、电信等下游行业面临成本上升与供应不确定性的双重压力。而新建存储晶圆厂需 150 亿至 200 亿美元投资且耗时数年,行业预测短缺至少持续至 2027 年。内存能力正成为半导体生态系统中日益具有战略意义的组成部分。缓解瓶颈需持续投资内存制造与先进封装产能,强化供应链韧性,扩大本土产能,并与可信伙伴协作,确保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不会挤压其他行业的生存空间。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i-has-memory-problem>

编译：黎彤

16、美国《外交事务》：破碎的核保护伞

6 月 23 日,美国《外交事务》发表达特茅斯学院政府学副教授珍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和政府学教授达里尔·普雷斯(Daryl G. Press)的文章《破碎的核保护伞:长期威慑之后会怎样?》。文章认为,美国主导的延伸核威慑体系建立于冷战时期,其可信度源于当时的高风险环境中美国能够以

自身遭受核打击为代价保护盟友。但冷战结束后，区域冲突取代全球对抗，美国战略重心收缩，尤其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强调联盟服务于美国核心利益，使美国为盟友发动核战争的承诺越来越在盟友与对手中缺乏可信度，继续依赖这一事实上已被削弱的威慑体系不仅可能误导盟友、助长对手冒险行为，还可能导致盟友仓促发展核武，引发冲突升级。文章呼吁，美国应承认自身已无法继续充当所有盟友的核担保者并支持盟友建立更符合现实的威慑安排。文章强调，坚持现有延伸威慑体系虽然短期内有助于维持美国影响力和遏制核扩散，但建立在不可信承诺上的威慑最终可能酿成灾难。无论美国是否愿意调整政策，盟友都可能主动寻求新的安全安排。美国应顺应趋势，支持盟友构建更加自主、符合当前地缘政治现实的威慑体系以降低战争风险，并在新的安全格局下维持稳固的联盟关系。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broken-nuclear-umbrella-lind-press>

编译：郅捷

17、美国 CFR：特朗普对伊“粮食换资金”协议或成为丑闻

6月29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发表国际事务研究员、前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人道主义谈判代表萨姆·维格斯基（Sam Vigersky）的文章《特朗普的伊朗“粮食换资金”协议易成为又一“石油换食品”丑闻》。文章认为，特朗普政

府正考虑释放 60 亿美元被冻结伊朗资金，但限定其只能用于购买美国原产人道主义物资。文章认为，该方案表面兼顾伊朗民众救济和美国农民利益，实质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将人道援助同美国国内市场目标相绑定的政策取向。文章警告，若资金和物资直接交由伊朗政权处理，美国援助可能被用于政治分配、控制不忠社区，甚至被转售或挪用来支持军队及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等代理人，从而重演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计划中腐败和回扣问题。文章强调，推进援助伊朗平民应避免缺乏监督的双边安排。美国应推动建立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管理的伊朗信托基金，要求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扩大在伊朗境内准入，并由联合国大会定期报告资金使用、人道需求和防止浪费、欺诈、滥用的保障措施落实情况。

<https://www.cfr.org/articles/trumps-iran-food-deal-could-easily-become-another-oil>

编译：张泉

编译：陆知宜、黄千茹、张泉、郜捷、黎彤、白一冰、李泓静、罗方婕、高靓瑜、贺宇希、陈奕好、钟珺雯、张佳延、杜宛鸿、程果、孙韵雯、张方琼宇

审核：许嘉伦、钱嘉童、周武华、申青青、刘源、郑乐锋